

保护地下水就是捍卫生存底线

实事求是地讲,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,高速度与零污染确实难以得兼,但是无论在哪里污染都应该有底线,必须保证空气和水的基本质量,这关系到所有人的生存。

评论员观察

□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

近日,地下水污染问题受到众多网友关注。有网友发微博,指潍坊市一些企业将污水通过高压水井排入地下深层。对此,山东省环保厅表示坚决打击违法排污,并欢迎网民积极举报,潍坊市环保局也悬赏征集线索。这个姿态不仅是与网民的互动,也是对所有人人生存底线的捍卫。

应当看到,地下水被污染并非一地一时所特有的问

题,而是多数地方普遍存在的现实。据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监测显示,约64%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,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%。此次网友热议水污染,正是民众环保意识增强的体现,应该得到地方政府的理解和呼应。因为环境问题,去年在四川什邡、江苏启东等地相继出现了群体性事件,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环保敏感期,降低环境风险其实也是降低社会风险。

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,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尚未走出拼资源、拼环境的粗放

模式。实事求是地讲,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,高速度与零污染确实难以得兼,但是无论在哪里污染都应该有底线,必须保证空气和水的基本质量,这关系到所有人的生存。今年春节前后,各地频发的雾霾天气已经引发了民众对空气质量的担忧,地下水污染问题无疑又加剧了民众的不安。与其他污染现象相比,地下水的污染更隐蔽也更致命,而且基本不可逆,无论是先污染后治理,还是边污染边治理,都很难取得

实效。现在,仅靠网民举报恐怕很难从源头杜绝地下水污

染,还需要各地政府部门正视问题,改变发展观念,在经济转型上做文章,做好利益平衡保护生态环境。通过各地网民的爆料和议论可以看出,当地有无水污染,又有哪些企业制造了水污染,民众都有比较直观的判断。如果一个城市不断地扩张化工产业,却从不在污水处理上立项投资,那么民众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疑问,污水究竟流到哪里去了。如果一家企业只公开生产数据,而刻意隐瞒排污数据和流向,那么民众也有理由怀疑其中藏了猫腻。民众能想

到的这些问题,环保部门当然不会懵然无知,但能否在监管上加大力度还需要跨越观念上的障碍。长期以来,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把为地方经济“保驾护航”误解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甚至不惜为污染做粉饰,这也是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重要原因。2010年,紫金矿业发生污水泄漏事故,上杭县环保部门之前不作为堪称典型。

污水处理在技术上应该不是大问题,对地方政府而言,更关键的可能是如何权衡地方经济与环境保护的轻重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

建设“美丽中国”,这不只是对未来的前景展望,也是执政理念的提升。各地环保部门应该与之俱进,认识到自身的职能不只是为了经济“保驾护航”,更应该为子孙后代守护“青山绿水”。事实上,面对空气和水的严重污染,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,不会有永远的既得利益。潍坊市环保局和山东省环保厅的回应表明,地方政府与民众在治理污染上能够达成共识,相互配合。现在,需要更多的地方主动回应民众的质疑和举报,使整治地下水污染的行动成为全民参与的环保活动。

>>媒体视点

编者按:大年初一,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通过微博公布了他的公车车牌号,“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,求大家监督我”。伍皓此举,引来舆论叫好,但随之也出现了批评之声,该如何理性看待伍皓的这一举动?

自曝车牌号公开了另一个“秘密”

在为伍皓自曝公车车牌号叫好的同时,不难发现,他在不经意间也公开了另一个“秘密”——作为一名副厅级官员,伍皓原本没有资格享有专用公车的待遇,但他却实实在在地享受了这种待遇,那辆被伍皓称为“自己的公车”的丰田越野车,实际上是一辆供伍皓使用的专车。

中央规定只有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才配备专车,伍皓

并不能享有配备专车的待遇,为他配备专车属于违规行为。原本不能配备专车的官员配备了专车,官员本人及所在单位并不认为这是违规行为,社会舆论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,说明人们对此已经积非成是,见怪不怪。公车腐败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,由此可见一斑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,作者:潘洪其)

让舆论接力监督“公车私用”

伍皓公开车牌号的公车不算“专车”,一时难有定论;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辆车目前主要是伍部长在用,如果是随机统一调度用车,也就不存在“公布部长车牌号”一说了。

问题在于,伍部长不公布这个车牌号,在制度上无法保证公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;但一旦公布车牌号,反而遭到新的质疑。怎么办呢?

从官员接受舆论监督的角度说,伍皓部长有义务“容得下尖锐的批评”,哪怕声音真的很刺耳。但另一方面,对

于敢为人先,扎实推进具体改革措施的官员,舆论监督应有一个“和风细雨”的态度,不能让改革者“压力山大”。真诚、切实的改革措施,理应得到民间善意的回应,让改革与民意形成良性互动,如此才能给体制内的改革以生存、发展的空间;如果一味对公示财产、公示车牌号的官员吹毛求疵,将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,要求改革者独立承担,这只会让不改革者、反对改革者得了便宜,更会堵塞改革的路径。(据《新京报》社论)

对伍皓“微改革”不必求全责备

现实条件下,公车改革能否积滴水为大川,进而带动三公消费改革的破局,官员的自觉配合起着重要作用。伍皓主动公布车牌号之举,既与治理三公消费方向一致,又与公众愿望合拍,理应认同。如同此前不少官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一样,这样的愿望,都应成为破冰正能量集聚的开端,而不是套用理论上的正义求全责备。

伍皓自曝车牌号,与此

前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一样,都表明了体制内呼应改革的愿望。个人愿望固然单薄,但也表达了一种立场。从这个角度看,伍皓不是没有资格坐专车,是否把公车当专车用,并非关键所在。公车改革,说到底还是官场利益和官场惯性的重新调整,求全责备,只会分流主动改革的意愿,造成改革成本增大,而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进。(据《京华时报》,作者:徐立凡)

伍皓需要质疑更需要掌声

老百姓最渴望看到的是实惠,而绝不是空口的承诺。伍皓能够主动限权,主动压缩自己的权力空间,主动让人民群众监督自己,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、更多的支持、更多的掌声。当然,舆论监督的继续跟进、群众眼睛的持续关注也是理所应当。

伍皓受到质疑,是社会

监督意识进一步增强的具体体现,但是,强化对改革者的监督,绝不应成为某些人对改革者仇视、攻击、挖苦、嘲笑的借口。需知,改革者也是凡人,也有各种不足和缺点,他们更需要关爱、理解和支持,他们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。

(据光明网,作者:于治国)



“目前,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,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。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,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,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。”前不久,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

会心态蓝皮书《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-2013》发布之后,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。

当所有的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时,社会氛围就会改变,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漠。蓝皮书指出,“小悦悦事件”、

信任“破位”

“南京彭宇案”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,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,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,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。

在西方社会,维系诚信的力量首先是法律,而在中

国,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。在一些专家看来,要想挽回社会诚信,必须依靠建立健全法律法规,严格执法,提高违法成本。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,失信的行为和权力滥用。

吴晓东/文 李宏宇/画

争迎贪官出狱报的是什么恩

□本报评论员 王昱

2006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11年的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,于近日提前出狱,当地官员和煤老板及名流富商们,争相迎接贪官“荣归故里”,或列队欢迎,鲜花簇拥,甚至欲以礼炮迎接;回家后门庭若市,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。(据2月16日新华网)

侯伍杰虽然犯了罪,出狱有人来接一下也属正常。问题是,来迎接侯伍杰的,既无平头百姓也少亲眷故旧,成分惊人地单一,主要就两拨人:官员和富商。商人重利轻离别,官场人走茶就凉。这些人不约而同如此高调地迎

接他,原因总不会都像“关爱刑满释放人员”那样温馨。

先说官员,侯伍杰当年为政一方,对几个官员有知遇之恩可以理解。但无论怎么说,侯伍杰是因为贪污受贿进的监狱,其坐牢对在职业官的提醒教育意味是浓厚的。什么样的恩情早不能报,晚不能报,非得毫不避嫌地在这个节骨眼上报?有媒体报道,侯伍杰当年曾放言,若再逼迫他,山西会有二三百名干部跟着倒霉,从此案后来的发展看,侯伍杰没再被“逼迫”。侯伍杰今日出狱犹如凯旋,这其中,是不是饱含了那“二三百干部”的感激之情?

若说官员还能用“知遇之恩、同僚旧情”来遮羞,煤老板们就太赤裸裸了。现代社会中,公权力与企业之间的互动被法律严格约束,法内的行为是照章办事,算不上什么“恩情”,法外的“恩情”则往往伴随着腐败。如今,煤老板们这样迫不及待地迎上去送鲜花,试问,侯伍杰究竟有什么天大的“恩情”让他们感念至今?这些“恩情”都查清楚了没有?一个已经68岁,不可能重返仕途的刑满释放者身上,有什么“稀缺资源”吸引着商人如此迫不及待地围上去?

在这场近似荒诞的闹剧中,我们依稀看到一种与民众

期望完全背道而驰的身份认同,这种身份认同背后,一些官员之间、官商之间俨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和利益共同体。在这个圈子里,本应属于公众的资源却在他们自己的利益小团体里被分赃,小圈子的利益被置于公众利益之上。从这一意义上,在职官员和富商十分入戏地为出狱贪官接风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迎接侯伍杰出狱的队也列了,花也献了,也许这些嚣张的行为并不违法,但其中的含义却让我们不得不警醒。

■本版投稿邮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